

普通話

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香港教育研究所

2001年5月8日，中心代表團拜會了教育部領導，雙方就推廣普通話、普通話水平測試、科研，以及語言文字規範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雙方人員坦誠交換了意見，會談氣氛愉快。



盧乃桂所長拜會袁貴仁副部長、李宇明主任

代表團團長盧乃桂教授在會上說，本中心成立以來，一直得到國家語委領導們的支持，有關推普工作才得以順利開展，成為校內一個推普單位之一，並面向香港社會，提供全方位服務，例如：定期舉辦普通話水平測試，舉辦各種類型的培訓課程，舉辦研討會、講座，進行與普通話有關科研項目，出版《普通話教研通訊》，以及提供普通話診斷服務等等，因此，中心具備測試、培訓、推廣、科研、出版、診斷等多種功能，今後仍會堅持推廣普通話的宗旨。

教育部袁貴仁副部長表示，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在香港的推普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推廣普通話是國家的語言政策之一，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與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可加大合作力度，進一步開展科研工作，特別是語用所和語委中心合併後，加強了科研力量，有條件進行各種各

樣的科研項目，包括語文教學的方方面面。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李宇明副所長指出，香港的普通話發展形勢很好，能聽說普通話的人比以前多。語用所今後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加強現代漢字的規範化和研究工作；探索媒體語言、網絡語言對社會語言的影響；面向機器，中文信息的研究要加強；要進行測試手段現代化的研究，以及測試信度和效度的研究工作等等。

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朱新均副主任表示，普通話在香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勢頭挺好。跟三年前比較，情況有了變化，語委中心和普通話教研中心一向關係良好，合作愉快，往後在測試

研究，發展普通話學習軟件方面，都有合作的條件，合作領域更為寬廣。

是次會談在教育部進行。參與會談的還有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姚喜雙主任、韓其洲副主任、宋欣橋教授，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何偉傑主任、林建平副主任。



教育部、國家語委領導與中心人員合影

暨南大學中文系

詹伯慧

從實際出發 思考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問題

(節錄)

香港普通話教育的三個“面對”

既然明確在香港開展普通話教育必須從香港的社會語文應用實際出發，這個“實際”我看主要有三個方面，也就是必須考慮的三個“面對”：

面對香港“兩文三語”應用的現實

在香港回歸前的1995年年底，一批關注香港回歸後語文發展的海內外學人曾聚集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了題為“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的學術研討會。那次會議上，與會學者圍繞着香港語文的走向及相關的一些問題宣讀了許多具有真知灼見的論文，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後出版了選錄50篇論文的《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論文集》。應該說，這是有史以來針對香港中國語文問題所舉行的一次最為集中、最具現實意義的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中涉及香港語文現象的方方面面，引起海內外學者不少的爭論。如今回憶起來，眼前還映現出一幕幕激烈精彩的論爭場面呢！

論及香港的語文狀況，在上述那次研討會上，繆錦安博士宣讀的論文有一段扼要的“引言”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香港當前的語言狀況是，存在三種主要的語言或方言—漢語香港話(也叫做粵語、廣府話、廣州話、香港廣州話)、普通話和英語。它們之間的關係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漢語和英語的關係，也就是中英文關係，另一方面是香港話和普通話的關係。中英文關係在語言關係中是主要的。香港話和普通話的關係相對於中英文關係比較次要。中英文的地位從來都是不平等的，而香港話和普通話也有爭持。但是，普通話(民族共同語)和香港廣州話地位之爭只是次要之爭，中英文地位之爭才是主要之爭。”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中的語文應用狀況正是繆先生所說的，有三種主要的語言或方言。這是就口語而言。就書面用語來說，實際上是兩種：中文和英文。這就構成了一般常

說的“三語兩文”。香港“三語兩文”的語言格局在英國殖民者統治香港時期就開始存在，只是“三語”和“兩文”彼此間的關係和各自所處的地位，隨着香港社會的發展變化不免會有一些變易而已。

關注香港“三語兩文”局面的人通常總是把視點集中到它們之間的關係和地位上。拿“兩文”來說，在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中，英語和漢語的地位自然談不上平等，英國統治時期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等領域都牢牢掌握在英國統治者的手裏，中文是不作為法定的文字的。經過有識之士的不斷爭取，殖民地統治者逐漸意識到讓中文處於從屬地位而與英文同時使用也許更為有利，於是才宣布從1974年起英文和中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語文。

盡管如此，重英文輕中文的本質並未改變。最明顯的就是一些法律上的文件、合約一般都用英文，即使有了中文本，也會註明：有歧異時以英文為準。回歸以後這種現象當然有所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條規定：“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回歸已經四年，現在我們回頭看看“兩文”在香港的應用情況，大致可以說，中文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中文在“兩文”中業已擺脫了從屬的地位，基本上有了平等使用的權利了。中英文相互地位的這一轉化，當然跟殖民地統治的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貫徹落實有關。事實說明，社會上不同語言地位的轉化，以至於語言政策的變化，決不可能單純從語言本體上去尋求答案。而結合實際情況，從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又總是制訂語文政策不可忽視的基本準則。基本法提升了中文的地位，完全符合香港的實際需要，絲毫沒有排斥英文的意思。由於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和英文在香港長期以來發揮的作用，香港特區《基本法》“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的提法，正是為了保證英文在香港主權回歸後不至於被削弱，說明我們國家高瞻遠矚，在制訂《基本法》時，是處處考慮到香港的實際，考慮到“一國兩制”的大前提的。

“兩文”的情況是如此，“三語”的應用情況又如何？長期以來，來香港社會中，盡管英語在某些方面，例如科技領域、涉外領域等有它的優勢，一般處於領先的地位。但從總體上看，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華人，始終還是以漢語作為社會用語。例如在文化娛樂、社交聚會和日常生活中，漢語母語總是通用的語言。問題不在漢語在香港的通行率非英語所能比擬，而在於香港社會所使用的“漢語”這個概念，是包括被港人認為屬於香港本地母語的粵語和在中國大陸各地通用的普通話的。我們常常聽到、也常常看到香港的媒體提及“母語教學”，這個“母語”其實就是“漢語”的代名詞，而絕大多數香港中小學所實行的“母語教學”，就是採用香港的粵語來作為

教學用語的。由此可見，香港的“三語”在實際應用中，香港粵語（廣州話）是始終處於主導的。這首先決定於香港居民來源的歷史背景，眾所周知，香港的人口近期的統計已接近七百萬，其中除了不到百分之一的外籍人士外，歷史上大部分都來自鄰近珠江三角洲的東莞寶安一帶。今天香港的新界，以前就跟寶安聯成一片，同屬共同的行政管轄區域，寶安東莞歷來都是粵語和客家方言的雙方言區，但其中珠江三角洲河網地區主要說粵語，從這一帶移民入港的歷來都比較多，他們在香港長期經營發展，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自然日漸提高和鞏固。近幾十年來陸續來自華南非粵語地區（客家話區、潮汕話區）的人，乃至來自外省，如福建、上海、海南、江蘇、浙江以至北方各省、市的移民，他們人數遠不及來自粵語地區的多，雖然也各自帶着不同的方言鄉音來港，但一旦進入香港社會，很自然就認同粵語為香港社會的通用語言，不懂粵語的也就自發地學起粵語來。連新界地區大

埔、上水
等地本
來先輩
是講

客家話的原住民，現在中年以下的人都說着香港的粵語，能用本地客家話交際的人已越來越少了。目前香港的語言生活狀況是：凡屬原籍屬於非粵語區的中國各省市人民，都心安理得地把粵語看作是安身立命、融入香港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這樣一來，香港粵語之成為香港公眾的“母語”代表，也就水到渠成，無可爭議的了。其實在香港的潮汕人、福建人、客家人、上海人以及海南人，也都各自有相當的經濟勢力，香港的巨富有許多並非來自粵語區的，文化學術界和娛樂演藝界的名流也有很多原籍為非粵語區的。他們在家庭中，在鄉親交往中都說着各自不同的鄉音，但當他們面對傳媒、出現在香港公眾的場合時，總是說起粵語來，連政府的高官也不例外。董建華首能說相當好的普通話、粵語和英語，但在面對香港民眾時，最常用的語言還是粵語。如前所述，

粵語之所以自然而然地成為全國人民通用的



交際工具，主要是社會歷史背景所使然。除此以外，另一個語言本身的因素也有一定的關係。香港使用的粵語，是個高度發展的漢語方言，在長期的應用中，它能夠有效地適用各種不同場合的需要，包括口語的運用和各種不同文體的運用，無論是英語或民族共同語（普通話）能夠應付的，粵語也都一定能夠應付。例如在娛樂圈中，用普通話唱的歌曲用粵語也都能唱；電影、電視中用普通話演出的好片劇集，同樣也都可以用粵語來演出。又例如在學術研討、教學活動、公眾事務、行政司法等各個層面，香港粵語都一一可以有效地擔當它的語言傳遞角色。這在漢語眾多方言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也正因為這樣，粵方言才被稱為“強勢方言”。在香港社會長期形成粵語的強勢以後，其他處於“弱勢”地位的漢語方言和處於全國通用語言地位的普通話，就都難以超越粵語而發展成為香港的主導語言了。不少香港居民，以香港擁有這樣一種作為母語的粵語方言而感到自豪。毋庸置疑，1997香港主權的回歸使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工作有了明顯的突破，以至於如今到訪港島的大陸遊客已不必為不懂粵語而感到為難，這是特區“三語”應用中的一大發展。然而，盡管近年來香港的“推普”成績斐然，港人中的大多數打心底裏對粵語的感情始終還是深於對待普通話的。從回歸後這幾年的情況看來，在香港社會語言應用的“三語”格局中，粵語一直是穩穩處於“三語”中最廣泛使用語言的地位上的。香港行政立法兩會的官員和議員開會時用粵語的明顯比用英語的多，使用普通話的鳳毛麟角，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回歸後在“三語”的應用中，粵語的主導地位是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此刻在香港開展普通話教育，自然應該面對這一現實，從這一現實出發來確立“推普”的指導思想，來給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定位。具體說來，在香港進行普通話工作，並非要讓普通話取代香港粵語在“三語”中的主導地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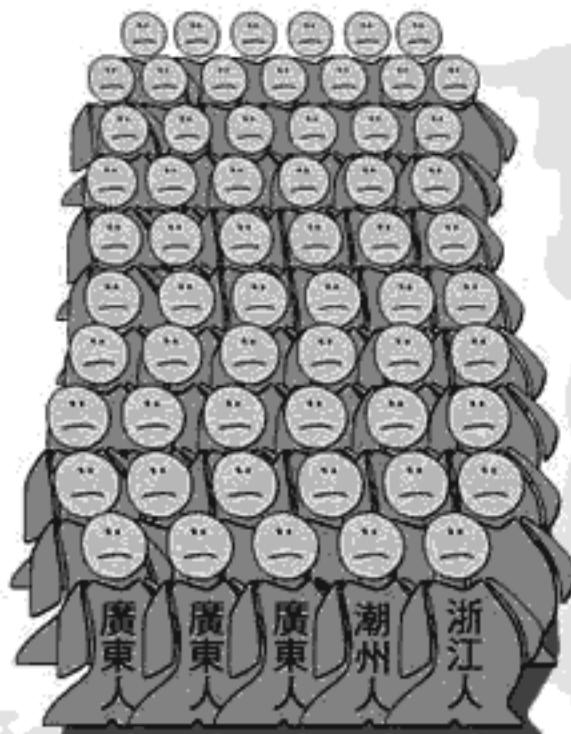
是要使只會說粵語的港人向着既能保持運用粵語作為香港社會中的公共交際工具，又能學會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在一定的場合運用普通話交際，包括能在學校中試行以普通話作為教學用語。這樣的目標好像跟大陸各方言地區“推普”的目標有相似之處：同樣是要使方言地區的廣大民眾學會普通話，從單一說方言的語言生活過渡到既會說方言、又會說普通話的雙語生活。但不同的是：大陸各地“推普”所要達致的“雙語”應用局面最終是要使雙語中的普通話成為主導的語言交際工具，讓方言的使用範圍逐漸縮小，跟普通話構成以普通話為主、方言為從的“漢語並用”，

有主有從”的社會語言應用格局。在香港社會中，由於香港粵語的主導地位十分牢固，即使再用勁推行普通話，終究不可能使普通話在社會上取粵語的主導地位而代之。眼下的情況是如此，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大概仍然還會是如此。這就意味着我們在香港所開展的一切推廣、普及、教學、研究普通話的工作，到頭來只是為了讓普通話能夠在“三語”的格局中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社會交際語之一的作用。拿來跟大陸各地“推普”的要求作比較，顯然就大不相同了。

面對大多數港人從未學過普通話的現實

如前所述，香港近七百萬人口中，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的南方省份，其中除來自珠江三角洲粵方言區的以外，其餘來自閩、瓊、蘇、浙、桂、台等省（區）的，也都分別帶着各自的方言進入港島，在香港定居下來以後，便都盡快地學習粵語，融入這個以粵語為主導的華人社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長期以來，港人除少數源自中國北方、具有天然會說普通話的以外，其餘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接觸普通話，也沒有機會學習普通話的。加上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幾十年間香港與內地幾乎處於隔絕的狀態，少數回鄉探親訪友的港人也都即使用家鄉方言和親人溝通，少有萌發學習普通話之念的。只是到了近二十年，在

改革開放大潮的帶動下，港人北上和內地接觸較多，才有不少人想起非學點普通話不可。而“推普”在香港能夠形成氣氛並逐步升溫，也是這十來二十年間的事。基於這樣的背景，面對着大多數港人從來未接觸過普通話的實際，回歸以來，出自各種原因，有意學習普通話的港人越來越多，這是件大好事。但在面對許許多以往未曾接觸普通話而現在急着要學會普通話的人士時，普通話教育從總體上說就不能有不切實際的過高的要求。換言之，如果把目標定得太高，使得所有學習普通話的港人都很難達標，那就會挫傷學習者的學習積極性，反而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個人認為，如果1994年國家頒布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標準”來衡量，對於一般長期沒有接觸過普通話的香港同胞來說，



通過一定時間的學習，測試結果能達到二級乙等的水平，即能夠聽懂普通話，說起普通話來難點音還未能克服，實際上是能說一口帶有方音的普通話，這也就差不多了。事實上，在南方方言複雜地區，“推普”要做到每個縣(市)都達到這樣的目標：一般人民群眾都會說比較標準的普通話，都能在公共場合用普通話暢所欲言，實在談何容易！據我所知，廣東省內還有一些城鎮居民，迄今仍然聽不懂普通話，仍然不能開口說普通話呢！我們廣東的有關部門，正在想方設法，加上“推普”的力度，爭取能夠早日消除“死角”，做到能使廣東各地都成為普通話與方言並用，進而讓普通話成為全廣東的公務用語、宣傳用語、教學用語和社會公用語呢！香港目前的“推普”形勢再好，畢竟還是得面對大多數人缺乏普通話基礎的現實，還是得實事求是，放寬要求，降低標準，才有可能扎紮實實地穩步前進，收到實際的效果。

面對現代白話文和方言口語差異的現實

這個問題跟中小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師關係密切。學校是進行普通話教育的重要基地，倘若普通話能在港九各地的中小學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香港“推普”的局面必然會大大改觀。在香港中小學的中文教學中，存在着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那就是語文課本中選進了許多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現代白話文名篇佳作，如果授課的老師能用普通話來講授這些篇章，學生也能聽懂普通話的話，可以做到言文一致，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可是當前香港的母語教學，基本上都是用粵語來作為教學媒介，語文(國文)科也不例外。這就帶了說寫不一、言文不一的困擾。大量事實說明，正是由於普通話未能進入語文課，學生不懂普通話，教師不能用普通話講課，教學中就往往出現一些與方言有關的毛病，課本中的名篇佳作，也難以在學生的

寫作中產生示範的作用。例如學生筆下常見“造”“做”不分，“少”“小”無別的毛病，就因為在粵語中同音的緣故。粵語教學影響學生提高語文素質，對語文教學造成障礙，這個問題在香港語文界常有議論，我想此事在開展普通話教育時也有必要加以關注。一方面，是不是可以考慮把中小學語文教學和普通話的學習結合起來，逐步培養一些能用普通話來朗讀白話文名篇的教師，把學生更好地帶進名篇氛圍中去；另一方面，要讓教師在普通話和粵語的比較中下點工夫，編些語音、詞匯的對照材料，作為教學參考。面對這個現實問題，教育主管部門和普通話教育研究機構宜緊密配合，切實給中小學語文教師提供必要的指引和幫助，使普通話的教育在語文教學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兩點建議

前面談了在“一國兩制”前提下開展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和在實踐中需要考慮的三個“面對”問題。下面再提兩點不成熟的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

增加中小學普通話課程的教學量

教育的基礎在中小學，普通話的教育，更非從小抓起不可。目前香港教育領導部門已明文規定中小學必須開設普通話課程。這體現了特區政府教育署對普通話訓練的關注和決心，對促進香港的“推普”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可是，教育署規定中小學每周只安排一節課學習普通話，教學量實在是太少了。對於那些從來沒有機會接觸普通話的學生來說，每周這蜻蜓點水式的一節課，又怎能學好普通話呢！是不是可以考慮每周增加一點學習普通話的課時？比方說，每周用一個半天(三到四節)的時間讓老師和同學一起開展形式活潑的教學普通話活動(包括課堂講授)，這樣也許會產生較好的效果。學生們在學校裏學了普通話，走出學校回到家裏，自然也會產生一些擴散的作用，這對於整個香港的普通話教育，無疑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設置語言文字工作機構

目前香港從事普通話教學的單位很多，這些單位層次不同，目標不一，五花八門，各顯神通。普通話教學進入了市場經濟的範圍，出現了非常激烈的競爭。為了使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工作健康發展，希望教育主管部門深入調查研究，以便心中有數，掌握全局，在總體規劃、資源配置方面作統籌安排。對近年來在普通話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的，要及時總結他們的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對中小學校負責普通話課程教學的教師要根據不同的情況為他們提供培訓課程，讓他們能夠適應自己的教學，以保證普通話教育的素質。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設立一個類似內地“語委”的專司語言文字工作的機構，規劃、管理並引導全社會的語言行為，制訂符合香港實際的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基本法》第13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政策。”我們期望特區政府在落實這一條文時，能夠認真研究如何更好地貫徹“三語兩文”，以保證香港語言文字應用工作的健康發展。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朱家珏

張銳

對推動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幾點建議

本港實施普通話教中文，主要困難是教師資源不夠，信心不足，學生的普通話水準參差不齊；就學校的語言環境來說，普通話語言環境較微弱，各科都在爭那點課餘、課間活動的時間與空間；就社會語言教育大環境來講，做為主渠道的廣播、電視，仍未把普通話節目列入改革日程。凡此種種，都會影響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這件好事的積極推進。我們在訪校過程中，不斷聽到老師們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現結合我們個人的領會，提出以下幾點想法。

加大宣傳力度

通過報刊、新聞媒體，正面宣傳逐步採用民族共同語授課，乃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標誌。逐步放棄方言授課，也是一切教育發達國家早已實施的教育語言政策。中國內地與台灣採用國語(普通話)授課(不僅是中文科，其他許多學科也用普通話授課)，其全面提升學生中文水平、提升基礎學力的經驗，也可以廣為宣傳、借鑒。特別是總結、推介本港一些學校的成功做法，對鼓勵廣大教師的信心必定大有益處。

加快培訓步伐

有關部門和學校，應有一個培訓教師的長、短期規劃。比如，可否在3-5年內，爭取有一半以上的中文科教師能用普通話授課，再有幾年，不僅所有中文科、歷史、中國地理等人文科學和部分數、理、化也嘗試用普通話授課。像目前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推出的用普通話作課堂語言的能力訓練課程，既能較快提升學員的普通話聽辨能力和表達能力，又能讓他們快速把握教師語言的種種技能，學習、借鑒中國內地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學經驗。該中心還為參加此項教學改革實驗學校提供漢語拼音注音課文、普通話授課常規用語介紹以及建立“普通話教學語言資料庫”等，都為培訓教師帶來很多方便。

從“小”“幼”開始

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是學習語言的“最佳發展區”。兒童和小學生學習普通話有三大特點：語言模仿能力強，一學就會；語言記憶能力強，採用朗讀、背誦教法，可較快習得普通話發音技巧和常用詞彙；小孩子不害羞，敢於開口，沒有什麼心理障礙；兒童唇舌軟嫩、靈巧，願意接受反覆的訓練，能很快建立起對普通話聲、韻、調的認知模型，且一旦養成，終身受用。伍華書院小學上午校，安排小學生誦讀《三字經》《弟子規》的成功經驗，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如果有更多的小學採用“全普通話”授課或部分用普通話授課，這些學生到了中學階段，再接受用普通話授課，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了。至於中一階段，也可找到學習普通話的“最近



發展區”，即利用中學生認知漢字的已有優勢，邊聽教師用普通話講解，邊視讀課文，聆聽理解率也較高。再利用小學階段學習的一些漢語拼音知識，逐步建立普通話課堂語言的認知模型，也是可以做到的。

四 推行彈性做法

目前我們還處於用普通話作為課堂語言的“初級階段”。該階段是告別方言授課走向“大母語”（有人講：民族共同語是“大母語”，各地方言是“小母語”）授課的“過渡期”。教師一下子採用“全普通話授課”，可能會遇到來自教師本人和學生兩方面的疑難。對此，不同學校採用不同的彈性做法：

1. 小一或中一，教師集中2~4週，專門講漢語拼音，初步讓學生掌握聲、韻、調的知識，然後採用普通話教中文。
2. 仍保留每週一節的普通話課，重點放在正音方面。
3. 個別課文如古詩詞用粵語朗讀或講解，其他課文全用普通話講授。
4. 令學生作短講練習時，鼓勵學生用普通話講說，給予加分獎勵。

5. 開學初，教師的授課語言是廣普並舉，讓學生對用普通話講授有一個適應過程；半個學期過後，教師用“全普通話”授課，僅在必要時用粵語作些詮釋。我們在訪校中瞭解到：以上彈性、變通措施是不得已而為之。並不會傷及採用普通話授課的大方向。經過師生一段時間努力，能順利渡過這個困難時期，就會逐步讓學生輕輕鬆鬆學語文了。

4. 組織採用普通話作課堂語言的學校教師進行交流，分享經驗。
5. 由大學的教育學院組織人力，分赴各校指導，解決教師們從教中的難題。
6. 政府有關部門考慮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師提供特殊津貼。以此，承認這些教師習得新教學語言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六 努力營造學校環境

各級學校領導應把學生習得民族共同語視為學校的職責，把營造一所學校的語言環境（中英並重）看成學校文化架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此，要對普通話的推廣、普及，執行傾斜改革。比如，把全校性的普通話課間活動和課外活動，正式列入學校統整的“活動課程”之中。擬選主任教師，擬定專門計劃，認真地去搞，營造出溫情的語言環境。讓學生不斷感受普通話的語音美、表意美、韻律美，以習得普通話為榮。學校每年可在本港出生學生中，評選出若干“普通話狀元”，在全校造成人人願說普通話的環境氛圍。這些做法，無疑對推廣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起到鋪路、造勢的良好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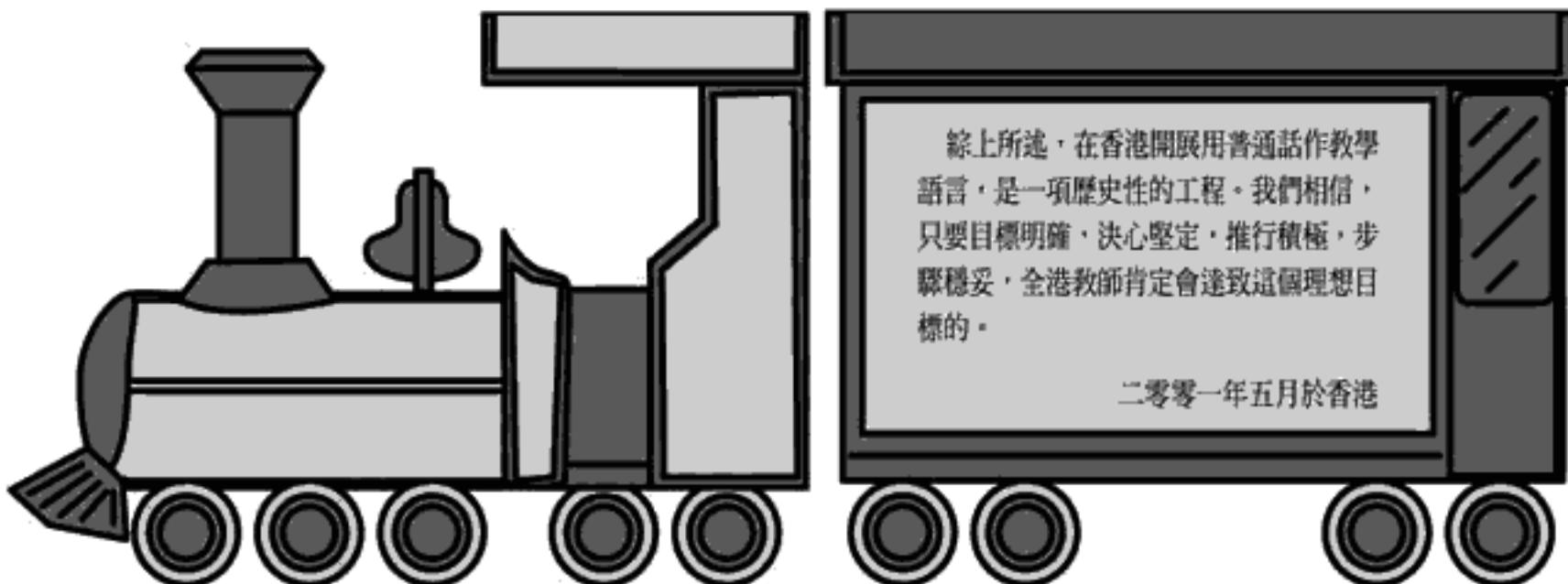
五 切實解決難題

結合各校提出的問題，有下述難題可否由有關方面解決。

1. 認真審訂2002年推出的新中文教材篇目，最好將這些課文中的廣東話詞語、句式，改為漢語規範的用法。建議新教材一律加上漢語拼音注音，並提供普通話朗讀課文的錄音帶。方便課上使用和學生回家聽讀。
2. 新教材中的重點詞語，要有一份加上漢語拼音的詞彙表附於全書後面，以利於教師帶學生複習、鞏固。
3. 教會學生使用漢語拼音查字。開展全港的查字典比賽。

綜上所述，在香港開展用普通話作教學語言，是一項歷史性的工程。我們相信，只要目標明確，決心堅定，推行積極，步驟穩妥，全港教師肯定會達致這個理想目標的。

二零零一年五月於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士（語文教育）課程

陳珊珊

北京遊學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間，自北京回來已經足有兩個半月了。

我們這個“北京普通話沉浸課程”，跟別的“北京團”可謂大不一樣：因為它是一個把學習地點從香港轉移到北京的普通話學習課程。其目標是透過四星期的“沉浸”學習，藉以提高我們對漢族語言、文化的認識，最後還要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簡稱 PSC)，考取認可證書。觀乎一般的北京團，它們大多屬交流性質；說到考試，就更不用說了。

課程目標既然是要考 PSC，那就意味著課程是刻苦的，而且是有規律的。果然，六月三號起程到北京的當天，一下飛機，我們就收到了緊密的課程時間表。一般來說，我們每天上兩節課：分別是上午八點半到十一點半和下午一點到四點—總共六小時！像這樣“正規”的課程，我想，對於已經習慣了沒有規律的大學生活的同學來說，是比較苦的。剛到北京的時候，是六月天，香港這邊的天氣是

炎熱而且潮濕，但是北京呢？她早晚溫差大、乾燥，和香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再加上吃的問題(我們愛吃清淡的，但北方菜偏偏是油膩而且辣)，對於我們南方人來說，就更加不習慣了。所以，剛住下的前幾天，就有同學感到皮膚乾裂、嗓子沙啞。

也許，在那時候，有同學會深深體會到“在家千日好”。剛開始的時候，我承認是要努力(甚至強迫)去讓自己適應下來。但是，大家畢竟是年青人，有年青人獨有的優勢—適應力強。整個課程，雖然說是緊密而且刻苦的，但是，經過老師們

的悉心安排，在兩三天的正規課堂學習中夾雜著一天半天的課外活動或者自由時間。所以，不消幾天，大家就上了軌道，按部就班地認真學習。

整個課程由國家語委的老師安排，我們從普通話語音基礎知識開始，學到朗讀技巧、詞匯語法等等。課程分大課和小課，大課主要由老師獨力講授，教的多是語音理論；小課可以說是個別輔導，老師針對各個同學的發音、語態作出糾正或者指點。由於學習的內容甚為豐富(兩萬多個字詞、二十篇文章、二十道說話題目)，所以我們必須在白天充實的課堂學習以外，晚上還得留在宿舍自習。

在這裏想順帶提一點意見。整個課程雖然長達四個星期，但真正學習的日子，前後就只有二十三天，第二十四天考試。課程的後半段，主要是刻板的學習；雖然偶爾有活動，但下課之後還有上課，晚上



參觀北京大學



吃我們在北京的第一頓晚飯



又要自習，同學都感到精疲力竭。再者，後期上的課，大多是小課。個別輔導雖然有效於提高個人水平，但是相對來說，壓力也特別大。那種煎熬，是無可名狀的，大概要親身經歷過才能明白。如果整個課程能夠拉長幾天，後半段的學習生活可以從容一點，同學就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考試，效果應該可以更好。

剛才提到，在正規的課堂學習之外，我們還有外遊和自由活動的時間。北京主要的名勝古跡，老師都安排我們集體去參觀遊覽。值得一提的是，帶隊的老師照顧周到，省卻我們不少麻煩。記得上長城的那一天，天氣忽地轉壞，不光下雨，氣溫也特別低(大約只有十五度)。由於大部分同學都沒有穿上禦寒衣服，也沒有帶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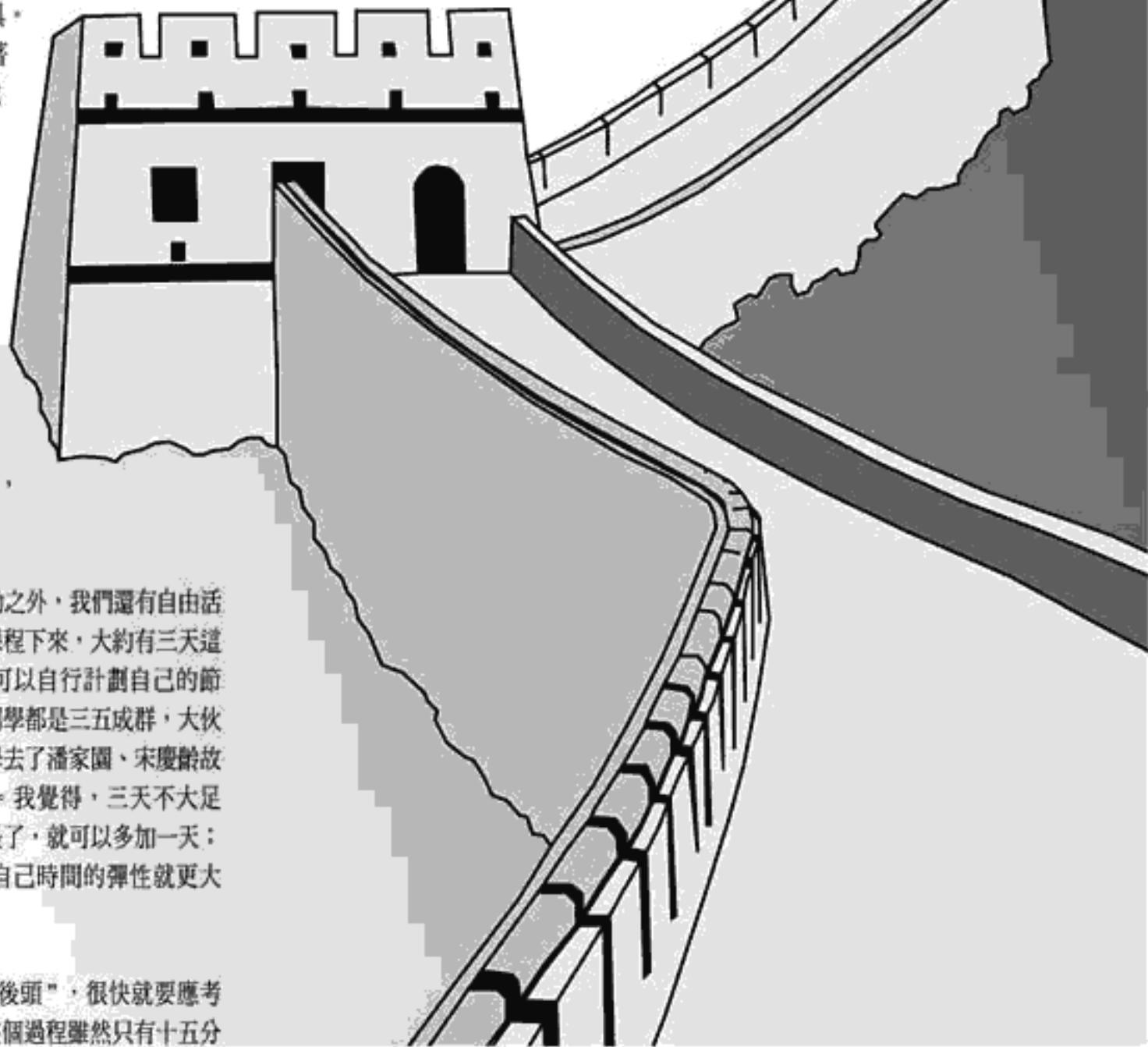
張老師怕我們著涼，於是馬上為我們每人買來雨衣，還吩咐我們必須穿上。後來回程的時候，她又要我們到宿舍樓下的餐廳喝紅糖薑湯(她特意吩咐餐廳弄的)。這樣無微不至的“保姆”，還真叫人感動！

除了集體活動之外，我們還有自由活動的機會。整個課程下來，大約有三天這樣的安排，同學可以自行計劃自己的節目。一般來說，同學都是三五成群，大伙兒去玩兒。有同學去了潘家園、宋慶齡故居、什剎海等等。我覺得，三天不大足夠，如果課程拉長了，就可以多加一天；那麼，同學安排自己時間的彈性就更大了。

所謂“好戲在後頭”，很快就要應考PSC了。考試的整個過程雖然只有十五分

鐘(最多)；但是，考試前所付出的準備，足有幾十個十五分鐘！面對三位陌生的考官，我們每位同學都傾盡所能，務求把自己最好的水平發揮出來。當踏出考場的第一步，我想，每位同學都有同樣的感受——如釋重負！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隨著“阿凡提”的狂歡後，北京之旅也快將結束。我們一行二十六位同學，離家不覺已經一個月了。在北京的點點滴滴，將永遠成為過去；但是，我深信，那一點一滴所積累的，卻是終生受用的智慧……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系(語文教育)課程

區錦芸

美麗的回憶 — 記普通話沉浸課程

這個暑假，我參加了由中大教育學院主辦，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協辦的普通話沉浸課程(北京)。課程由六月三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除了上課學習普通話外，國家語委的老師們也為我們安排了各種各樣的活動，讓我們透過生活全方位學習普通話。課程完結，我和幾位同學在北京多留了八天，遊覽了北京附近一些著名的旅遊城市。下面我將分三部分來介紹整個旅程。

一、學習篇

在北京，上課跟活動是相間進行的，一天出外活動，一天留校上課。上課的日子我們每天學習六小時，上午三小時，下午三小時。北京人習慣早睡早起，最初的幾天，我們未能適應這樣的作息時間。早上上課的時候，我們都睏倦極了。幸好，國家語委的老師們也體恤我們初到京城，未能適應。對於我們的一面倦容，老師們並沒有責怪。上課的老師，都是很資深的普通話老師。他們很了解粵港地區的學員說普通話的難點在那裏，因此教學就更事半功倍了。

整個教學十分清楚、有系統。課堂分作大課和小課。大課的上老師教我們正確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小課的老師則為我們提供個別輔導，糾正發音。我們的發音不準確，老師們立刻就能指出是發音部位不正確還是發音方法有問題。這樣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和糾正，我的普通話發音也就改善了不少。同時，他們這個有效的教學方法，對於我將來的普通話教學也有很大的啟發。

課程完結前，我們參加了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大部分同學都考到了理想的成績，我也考獲了二級甲等的成績。以後我還會繼續進修普通話，這一次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 圓明園留影
► 註真學習，留心聽講

二、活動篇

這個課程除了上課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活動。生活雖然忙，可是我們覺得每天

都很充實。我們到過北京的國營百貨商店當售貨員，在那裏跟地道的北京人學習普通話。也到過著名的老舍茶館，嘗北京的風味兒小吃，看老北京的經典名戲。後來，還到剛落成的中華世紀壇和長安大劇院參觀，在長安大劇院看了一齣現代話劇，這齣以現代手法包裝傳統革命題材的話劇的確讓我大開眼界。

北京是個歷史名城，來到北京當然少不了去參觀一些有代表性的歷史建築。長城、故宮、天壇、頤和園和圓明園，這些是遊人必到的景點。其中圓明園給我的印象最深。圓明園是一個遺址，它的堂煌、華麗已不復再。但在這片曾被譽為“萬園之園”的頽垣敗瓦之中，卻讓我憶起了中國人的光榮和恥辱。

三、自費旅行篇

我和兩位同學希望有更多的生活體驗，因此課程完結後又自費在北京多留了八天。我們到了著名的海濱城市—北戴河、秦皇島和避暑勝地—承德山莊。北戴河、秦皇島的景色十分優美，四面環海。雖然無緣觀看美麗的海上日出，但是每天晚上我們都會走到海邊欣賞醉人的夜色，與海溝、明月歡聚。承德山莊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不過，可能因為我們是南方人受不了內陸的氣候，即使走進皇帝的行宮也不覺半點涼快。原來我們的生活比皇帝還舒適呢！

旅程結束已近一個多月。然而在我的腦海裏永遠有這個的美麗的回憶！



教研活動

5月8日

本校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中心主任何偉傑教授、副主任林建平教授前往北京，拜會國家語委領導，彼此就推廣普通話和加強雙方人員合作互訪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中心訪問教授張銳教授、朱家珏教授、中心主任何偉傑教授、副主任林建平教授應“携手更生校園國際研討會”的邀請，出席第七節座談會。該座談會的主題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回顧與前瞻”。何偉傑教授從漢語教育的角度出發，談影響雙語教育的因素；張銳教授結合訪校活動中觀察、座談等實踐經驗和體會，對推動用普通話教中文提幾點建議；朱家珏教授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進一步落實香港“兩文三語”的目標，並總結目前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有利條件；林建平教授概括當前的語文教師/普通話教師多數能說“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將會是教改的其中一個環節，語文教師須作好裝備，以考取普通話水平測試一級乙等成績為努力目標。

5月24日

5月26日及27日

中心續辦第13屆普通話水平測試，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派出孫海娜老師主持面測，測試順利完成。



6月3日

中心副主任帶領26位本院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中文組學員到北京，參加為期4周的“普通話語言文化證書課程”。該課程由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協辦，學員住在北京廣播學院國際交流中心。課程包含普通話能力訓練、測試、旅遊、文化及生活體驗等。所有學員都考獲入級的成績，近四成學員考取二級成績，其中一人考獲一乙佳績，三人考獲二甲成績，反映“沉浸”的學習模式，能有效提升學員的普通話水平。

6月16日

中心副主任應邀出席“香港推廣普通話大聯盟”第一次籌備會議，會上，與會者討論了特區第一屆“普通話日”的細節安排，以及推廣普通話的活動。

普通話教研通訊 2001年6月第15期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出版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何添樓111室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pth>

版權所有，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轉載